

國際合作在臺灣：聯合國與臺灣的都市計畫（1960-1971）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aiwan:
United Nations and Taiwan's Urban Plan, 1960-1971

許峰源 Hsu, Feng-Yuan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天主教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Researcher, Service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摘要

西元（以下同）1960年代，臺灣都市發展已經出現許多困境，政府必須擁有明確的方針，擬定未來都市發展計畫，以解決日益叢生的問題。當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與其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致力爭取聯合國特別基金、聯合國發展計畫，獲得國際技術援助，俾使聯合國都市計畫顧問團來到臺灣考察，協助政府擬定都市發展計畫；另外，中華民國也獲得聯合國的資助，遴選臺灣都市計畫人員赴國外考察、進修，提升專業技能，擴展國際視野。中華民國政府依據聯合國的規定，成立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讓臺灣技術官員、年輕學員透過平臺與聯合國都市計畫顧問團交流，充實各項知識與技能，共謀臺灣都市發展。另一方面，聯合國都市計畫顧問團也協助臺灣大專院校設立都市計畫學系、都市計畫研究所，培訓都市計畫新血輪，至今仍深刻影響臺灣人才的培育。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都市計畫顧問團也針對當時臺北市升格後行政區域管轄範圍，與臺北市鐵路高架化提供諸多建言，為臺北市都市發展建設提供寶貴參據。

Abstract

In the 1960s,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during Taiwan's urban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must have a clear policy and formulate a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plan to solve the growing problems. At that tim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maintaining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riving for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lan, and earning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assistance. The United Nations Urban Planning Advisory Group came to Taiwan to conduct inspections and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planning urban development. The plan, as well as sending Taiwan urban planners to study abroad, expanded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regula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set up a city 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planning team to allow Taiwan's technical bureaucrats and young students to continuously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Urban Planning Advisory Group on this platform to conspire Taiwan's urban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Nations Urban Planning Advisory Group has also assis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o set up th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th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to train new blood of urban planning, which still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aiwan's talent training.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Urban Planning Advisory Group also provided advice on the jurisdiction of Taipei's upgraded administrative area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elevated railway in Taipei, and witnessed Taipei's urban development history.

關鍵字 | 都市計畫、國際合作、聯合國特別基金、聯合國發展計畫、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臺灣、臺北

Keywords | urban projec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SF, UNDP, UHDC, Taiwan, Taipei

壹、前言

聯合國（United Nations）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運行至今已逾 70 年，對國際事務有深度影響力，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根據《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第 1 條規定，聯合國成立的宗旨，在於維繫世界和平，保障國際安全，促進國際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合作，提升全人類福祉。由此觀之，聯合國不僅肩負維繫國際和平與消弭戰爭之任務，更致力全球經濟共榮發展，全面促進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聯合國憲章》在 1945 年 6 月 25 日正式通過，中華民國簽署憲章，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8 月 15 日，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後，投注聯合國實務，躋身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以下簡稱安理會）常任理事，與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共同決策國際政治實務。後來，因陷於國共戰爭泥淖，影響在聯合國的表現。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在北京建國，是年底中華民國撤退臺灣，形成兩岸抗衡的態勢。爾後，臺海彼此對峙，雙方文攻武嚇，在國際場域不斷爭奪中國正統地位，而受到冷戰局勢的影響，以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受到各界矚目。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亞洲局勢丕變。美國轉而援助臺灣，一同圍堵共產政權。聯合國中國代表權歷經 1950 年代緩議方式、1960 年代重要問題案，中華民國在美援框架下，尚能穩固安理會常任理事地位，參與聯合國大小活動。1971 年，中華民國失去常任理事席次，退出聯合國及周邊組織，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

歷來，有關 1950 至 1971 年中華民國與聯合國關係的討論，偏重其捍衛中國代表權的表現（註 1）。聯合國由大會（General Assembly）、安理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以下簡稱經社理事會）、託管理事會（Trusteeship Council）、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秘書處（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等 6 大機構及其他委員會、專門機構、輔助機構組成，襄理全球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教育與文化事務。安理會是維護國際秩序的權力機構，期間中國代表權爭議，與「控蘇案」、「外蒙入會案」、「會費清償」等議題都圍繞安理會而起（註 2）。必須注意的是，1950 至 1971 年中華民國為聯合國會員國，在此期間參與重要機構、各理事會與專門機構大小活動，甚至派員擔任機構要職（註 3）。

聯合國除維繫國際和平任務，也致力全球共榮發展，透過技術援助，協助會員國發展經濟，提升生活水準，加速文化交流。實際上，技術援助、國際合作、文化交流本身就是國際組織的重要職能，揆諸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國際組織多以推廣交流為職志。例如，19 世紀下半葉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的成立，在於尋求國際郵政事務的合作與技術交流。20 世紀上半葉，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努力拓展國際合作事務，其所屬的國際勞工組織便以技術援助方式，協助會員國改善勞工問題（註 4）。

聯合國成立之際，技術援助與文化交流亦為重要事務。經社理事會為實踐工作目標，規劃專門機構落實「技術協助經常方案」（以下簡稱經常方案），該方案各項活動費用，是由各機構經常費支付，經常費則來自於會員國每年按比例繳納的會費。隨著冷戰局勢緊張，美國、蘇聯兩大集團在聯合國抗衡，加上許多國家長年積欠會費，迫使該方案面臨執行困境，無法發揮正常效能。

1949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為讓聯合國專門機構充分發揮功效，提升全人類福祉，決定由美國擬定技術協助擴大方案（以下簡稱擴大方案），向經社理事會提出申請案。

8月15日，擴大方案獲得會員國支持，經社理事會通過該案，設立技術協助委員會為決策機構，成立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局（UNTAA），負責主持業務，推廣國際合作事務。擴大方案的經費，由會員國自動捐贈獨立帳戶，不與聯合國經費混用。在美國的支持與鼓吹下，計有54個會員國繳存高達2千零3萬5千美元資金，充分提供應用。擴大方案籌募的款項經釐訂百分比，分配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局，與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ESCO，以下簡稱教科文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電信聯合會（ITU）、世界氣象組織（WMO）等專門機構，全面落實技術合作事務（註5）。簡言之，經常方案所需經費是從聯合國整體預算下列支，擴大方案經費由會員國捐贈，後者挹注款項高出前者3-4倍，加上推行範圍廣泛、效益明顯，受到舉世矚目。從1950年7月至1960年6月，在此10年間擴大方案捐款國從54國增至86國，這些款項讓超過140個國家與地區受惠，8,000名國際技術專家提供直接服務，並資助14,000名會員國成員赴外進修、考察，充實專業知能。總之，擴大方案透過技術援助與交流，提升受援國生產技能，達到增產的目標（The Technical Assistance Board, 1958）。

1949年底，中華民國撤退至臺灣，受限於各類資源缺乏，整體財政發展艱難。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中華民國甫獲美援之際，更不遺餘力向聯合國申請經常方案、擴大方案，爭取國際技術援助、交流與合作，強化臺灣建設。實際上，中華民國捐贈的款項，只占全部國家捐款總額一小部分，但獲得實質的技術合作計畫經費與資源，遠超過捐款數目。這些經常方案、擴大方案提供中華民國的援助，可分為4個面向：第一、聯合國針對不同性質的計畫，將委派各專門國際專家赴臺灣先行考察，針對實際狀況

提供技術服務，傳授各類知識以落實計畫內容。第二、頒贈獎補金，提供臺灣技術官員赴國外接受訓練，經過專業課程進修，提升實質技能，轉而應用在國內的實業發展。第三、在臺灣內部舉辦講習會、訓練班與各類示範工作，號召會員國專門人員和臺灣專家一同觀摩、學習，彼此交換意見，互相激盪。第四、供應設備材料，輔助國際專家落實相關業務。這四大面向以國際專家提供臺灣技術服務，以及臺灣專門人員接受獎補助金赴國外進修、考察最為重要。一般而言，聯合國通過中華民國的申請案後，緊接著派國際技術專家赴臺考察，根據勘查實況提供智能與技術服務，協助改善社會發展困境。另外，臺灣技術專員受惠各項計畫補助，前往許多國家進修、考察，取法他山之石，裨益臺灣實業發展。待這些計畫一一落實，臺灣經濟有良好的進展，臺灣技術專員也受到聯合國青睞，爭相邀請擔任國際技術專家，前往其他國家交流技術，將臺灣寶貴的經驗推向全球（許峰源，2015）。

1960年代，中華民國爭取聯合國經常方案、擴大方案協助之際，也經常向聯合國特別基金（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申請援助，形塑聯合國與臺灣的國際合作關係。聯合國特別基金是1959年成立的機構，其宗旨在於協助開發中國家加速社會與經濟發展，提供系統性、不間斷援助，創造美好生活（註6）。1962年，中華民國向聯合國特別基金提出的第1個申請案，是有關臺灣都市發展計畫。由此可知，臺灣經濟與社會歷經發展，業使人口集中都市，許多都市發展與國民住宅問題的解決成為當務之急。爰此，中華民國爭取聯合國特別基金支援，希冀解決都市發展困境。待都市計畫發展援助申請案，經審查後通過，聯合國隨即舉派國際專家顧問團前來臺灣考察，針對都市發展現況提供建議與協助。中華民國特別成立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Urban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Committee, UHDC，以

下簡稱都市計畫小組），其成員為聯合國專家顧問團與臺灣技術官員，藉此平臺相互交流心得，分享寶貴經驗，共謀都市發展方針。

相關研究方面，聚焦都市計畫小組沿革的有許家緯「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1966-1971）對臺灣都市規劃影響之研究」，梳理聯合國舉派專家顧問團至臺灣，剖析都市計畫小組的運作模式、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規劃方案的實施與影響，以及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對 1970 年代臺灣都市規劃與都市發展的影響，呈現聯合國專家顧問團與臺灣技術合作的輪廓（許家緯，1999）。另外，陳湘琴「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UHDC）和聯合國顧問團研議臺灣《都市計畫法》之歷史研究」，藉由都市計畫小組與聯合國專家顧問團研議都市計畫法令，強化該小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都市計畫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聯合國技術專家對臺灣實質協助，著重該小組開啟後續臺灣國土、區域和都市綜合性整體規劃，以及開發工業都市與新市鎮的影響力（陳湘琴，2011）。

由此可知，都市計畫小組對於臺灣都市設計、都市發展的助益甚大，除《都市計畫法》奠定日後都市發展根基外，其對於臺灣都市實質發展，以及都市計畫人才的培育，又有哪些實質的效果？本文梳理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典藏的國家檔案，輔以相關報刊資料，參考王章清（1920-2011）、張祖璿等人實際參與都市計畫小組運作紀錄，考察 1960 年代臺灣都市發展梗概，分析臺灣與聯合國透過國際合作模式，進而改善都市發展問題的實質功效。

貳、臺灣爭取都市計畫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遭到戰火祝融，許多城市無法躲過戰爭破壞，遍地滿目瘡痍。戰爭結束後，歐洲尚待復興，亟需龐大住宅安置大

量流動人口，許多城市陸續啟動建設，恢復產業生產鏈。歐洲擁有良好工商業發展基礎，加上美國啟動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加速城市復興作業。至 1950 年代，歐洲就業問題叢生，例如大量人口流向倫敦、羅馬、巴黎大都市，勞動人口分布不均；另外，受到國際冷戰局勢影響，造成人口流動，譬如東德人口遷往西德，東歐人口轉至西歐等。隨著大量人口的移動，歐洲迫切需要都市復興與興建大規模住宅。爾後，西歐、北歐對都市建設、住宅興建事業著力甚深，成效有口皆碑。

1950 年代末期，亞洲許多都市開始出現人口擁擠現象，浮現交通輸運困難、住宅不敷使用等都市問題。1961 年 7 月，聯合國關注亞洲都市發展，邀請日本、韓國、中華民國等 15 個會員國組織考察團（Housing and Building Material Study Tour），舉派各國國民住宅或都市建設高級官員，前往歐洲考察。中華民國接受邀請後，派遣臺灣省建設廳公共工程局局長王章清前往歐洲，考察西歐住宅建置，作為未來國民住宅建置與都市發展借鏡。根據王章清的考察紀錄，荷蘭比臺灣優美的因素，除了東西文化差異，若是從都市發展而言，其計畫管制亦為重要因素。荷蘭填海造陸，凸顯土地珍貴，透過有系統國家計畫（National Planning）、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景觀設計等，讓每寸土地發揮最大的效用。至於其他歐洲國家也把土地取得視為政府施政要領，例如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湧進大批難民，迫切需要更多的住宅進行安頓，因此計畫先建造並提供臨時住所，待正式住宅完工之後再遷入。這些難民能否成功安頓，關鍵在於政府土地的取得。西德為達到該項目的，每年加倍徵收空地稅，使地主無法負擔高額稅款而釋出土地。另外，瑞士未受戰禍破壞，為求都市發展，也將土地政策視為施政要領（王華燕編，2018）。

至於英國方面，為減低大都市房屋需求，紓緩交通壅塞壓力，在許多大都市附近闢建「新鎮計畫」（New Town Plan）。例如，距離倫敦 50 英里的哈羅新鎮（Harlow New Town），將原本 6 萬人口規劃為 8 萬人，讓該都市可以滿足人口居住與就業條件，形塑自足（self-content）狀態。同時，英國為避免人口高度都市化，從 1930 年代起已經開始落實工業區（Industrial estates）計畫，只是隨著都市地價高昂與環保意識抬頭，也出現工業區與都市隔離的現象（王華燕編，2018）。總之，聯合國組織考察團，實際走訪西歐大都市，試圖讓亞洲會員國借鏡發展，深諳都市規劃的重要性。

1960 年代，全球已開發國家或正值開發中國家，伴隨工業日益進步與交通愈形便捷，大量人口已從鄉村或偏遠地區遷往都市，形成都市化現象。只是，當眾多人口過度集中都市，超過都市原本結構，公共設施不堪負荷，衍生民眾生活問題，最常見的就是住宅、房屋不敷使用，違章、簡陋建築紛紛湧現，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當道路及運輸工具無法配合都市發展，出現交通擁擠現象，導致社會秩序紊亂。若上、下水道建設以及公共衛生事業落後，勢必危害民眾居住環境衛生，減損生活便利。除此之外，還可能衍生許多社會性問題，例如犯罪率的增加與就業機會不足等，都可能使得都市發展與整體環境趨於惡劣。聯合國關注全球議題，對於都市化現象及其衍生的各項問題，除了號召考察團觀摩歐洲城市發展，也經常召開國際會議汲取共識，尋求解決都市化所產生的各項困境（註 7），甚至擬定各種國際合作計畫，提供會員國申請，透過技術援助與合作的方式，紓解困境。

195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不斷展開經濟與社會建設，造成大量人口快速往大都市集中。1960 年代初期，臺灣都市發展及國民住宅問題已經浮現隱憂，亟待設法解決。

1962 年，臺灣省政府辦理臺灣省都會區域計畫，鑒於工作事務的調查、測量與研究規劃事宜，與聯合國特別基金資助會員國進行都市計畫不謀而合，而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參與許多專門機構大小活動，加上曾多次爭取擴大方案援助臺灣，遂擬定「都會區域設計計畫」，爭取聯合國提供都市計畫類援助。但內政部認為以「都會區域設計計畫」為名過於偏頗，為避免以大都市為中心過於膨脹，侵害附近鄉鎮農村環境，失去城鄉均衡發展的原則，以及影響當時防空疏散計畫，建議刪除原計畫「都會」兩字，改為「臺北地區區域設計計畫」（註 8）。

1962 年 8 月，臺灣省政府彙整各方意見，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申請「臺北區域計畫」，爭取國際合作。11 月，聯合國特別基金遠東主持人柯利（J. N. Corry）訪問臺灣，在與外交部專員進行意見交流後，隨即修訂該項計畫，並以非正式方式送往紐約。聯合國特別基金認為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尚非臺灣迫切急務，未同意給予支援。1963 年 4 月，柯利再次訪問臺灣，建議外交部先向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局申請擴大計畫，爭取技術專家短期赴臺，在該項基礎上賡續申請聯合國特別基金的支援（註 9）。對此，聯合國特別基金大抵同意柯利的建議，表達將來可與臺灣攜手都市計畫的合作。

值此之際，聯合國特別基金不斷接獲其他國家申請都市計畫援助案。例如，阿根廷爭取區域計畫，聯合國特別基金先派遣技術專家孟松（Donald Monson）至阿根廷詳細考察，經過孟松的審核後，聯合國特別基金再按照其意見評估援助阿根廷事項。臺灣都市發展迅速，亟待與國際組織合作，爭取專家參與計畫，也藉機培育國內人員。臺灣省政府再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爭取專家支援，聯合國特別基金在處理阿根廷個案的基礎上，重視會員國區域與都市計畫，再請孟松赴臺灣實際勘查。1964 年 8 月，孟松抵達臺灣，依序

前往各地區進行調查工作，同時也留意臺北、基隆、高雄區域計畫問題。至 10 月，孟松完成初步報告書，指出 1952 年臺灣都市人口占 47.6%，1963 年增為 52.8%，按照都市人口增長趨勢，至 1983 年將增為 60%，2000 年可能增至 67%，認為都市公共建設必須因應人口不斷增長，必須事前妥適安排，否則可能導致社會資源分配失當，阻礙都市經濟發展。孟松特別舉出美國底特律的實際案例，說明其事先未計畫建置污水系統，導致後來挹注改善污水問題費用，高出原本工程費數倍之多。孟松完成初步調查作業後，進一步研擬「聯合國特別基金協助都市計畫發展與國民住宅計畫」，建議中華民國對都會區域及都市計畫應儘快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爭取援助，強調臺灣經濟發展已達到「起飛」階段，將進入工業加速發展期，高效率的都市公共建設已有迫切性需求，必須規劃最佳都市結構以支撐後續工業發展。依據孟松所訂定的計畫，臺灣可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爭取包括經濟、人口、社會、實質結構及都會區域，都市及房屋計畫等 10 名專家提供協助，以及派專員赴國外考察實習，這些費用大部分由聯合國特別基金支付，中華民國政府將視實際情況適時補充不足的款項（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譯，1964）。

1964 年 10 月 28 日，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王章清與孟松會晤訪美歸來的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1910-2001）。當時，美國已決定從翌年夏季停止援助臺灣，臺灣勢必得要尋求另外的管道爭取支援。李國鼎當下贊同該項計畫與建議，立即請孟松給予最大的協助，擬定正式申請書，在年底前送至聯合國特別基金辦理，爭取 1965 年 6 月聯合國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期間核定通過申請書，挹注臺灣資源（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譯，1964）。

1965 年 2 月，中華民國在孟松的協助下，

正式向聯合國特別基金提出申請案。6 月，聯合國特別基金再派遣技術專家華德（Watts）前來臺灣考察，經過雙方協商之後，再酌予修正原計畫書，提交並列入聯合國特別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的議程。計畫書內容有：

- 一、計畫金額：美金 643,300 元，配合款新臺幣 27,132,000 元，由臺灣省政府及經合會各負擔一半，分 3 年支付。
- 二、計畫年限：3 年，自 1966 至 1968 年。
- 三、執行機構：聯合國特別基金要求在計畫書內明訂 1966 年設立一個小組委員會，由相關單位選定代表共同組織，審議聯合國專家提出之方案與建議，並負責協調聯繫工作。
- 四、機構組織：聯合國專家 7 人，中華民國職員 61 人，分別設立行政、研究分析、規劃設計及測量繪圖等 4 組（註 10）。

1966 年 1 月，聯合國特別基金與擴大方案合併為聯合國開發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針對各項議案討論後，決議通過中華民國先前提交的都市計畫發展案。4 月 3 日上午 10 點，該項都市計畫發展方案在臺北市重慶南路臺灣銀行總行 2 樓禮堂舉行簽約典禮，由內政部長徐慶鐘（1907-1996）與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局秘書長胡世澤（1894-1972）、聯合國開發計畫駐中華民國代表溫特共同簽署後（圖 1、圖 2），再經過聯合國開發計畫正式核定，準備啟動作業。值得一提的是，胡世澤是著名的外交家，曾任中華民國駐瑞士公使、外交部常務次長，以及 1931 年出任國際聯盟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胡世澤成為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著名的職員，1946 年 3 月擔任秘書處助理秘書長，主持託管與非自治領土情報部，出訪多國斡旋，獲得託管事務專家的美譽。1955 年轉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掌理會議事務部。1962 年起，擔任聯合國技術合作專門人員，致力促成聯合國與會員國的技術合作事務，也多次襄助和



圖 1 聯合國開發計畫協助臺灣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實施方案簽約典禮（前排分別為左：胡世澤、中：徐慶鐘、右：溫特）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檔案（1964）。東亞、中東、中美洲外交專輯。檔案局藏，檔號：0055/0036/1



圖 2 內政部長徐慶鐘在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實施方案簽約典禮發表談話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檔案（1964）。東亞、中東、中美洲外交專輯。檔案局藏，檔號：0055/0036/1

臺灣的技術合作計畫。

該項計畫自 1966 年 4 月正式執行，原本預估雙方合作時間 3 年，後來因事務龐雜，延展至 1971 年，前後歷經 5 年。至於執行方式，在計畫正式通過後，經合會旋即依照組織規程的規定，成立「都市建設與住宅興建計畫小組」，由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經合會及臺灣省政府相關單位代表共同組成。計畫代表由經合會秘書長擔任，內政部長兼召集人，經合會秘書長陶聲洋（1919-1969）兼任副召集人，聘任委員 17-19 人，徵選都市發展各級主管擔任專家。當時臺灣省政府公共工程局局長王章清兼任執行秘書，負責推動相關事務。除聯合國特別基金派遣專家外，世界衛生組織亦派 1 人支援，經合會也聘請 1 人，由孟松擔任首席顧問（Project manager），協助研究與考察工作，其他成員則參與會議諮詢、出席各項會議、討論與督導調查工作、提出專業報告與演講，以及培訓專門人才等實務（註 11）。

參、都市計畫人才的培育

都市計畫小組為達到集思廣益的功效，以及加強聯繫相關機構、部會，進而順利推展工作實務，在小組成員的基礎上，先後又設立都市交通（1966 年 11 月 18 日設立）、都市土地（1966 年 12 月 27 日設立）、住宅（1967 年 2 月 17 日設立）、都市行政（1967 年 4 月 14 日設立）、都市環境（1967 年 6 月 2 日設立）等 5 個專門問題研究團隊，分別由葉昌鑄、周一夔、樊祥孫、方開啟、范純一擔任召集人，負責邀請各機關代表、專家學者與國際專家一同交流，研討各項專業問題（註 12）。

根據陳湘琴的研究，歸納都市計畫小組工作具體成果，包括「都市計畫」，例如臺北市火車站一帶改善計畫、林口特區計畫等；「住宅」如住宅法草案等；「土地」如市地重劃與細部計畫配合方案等；「交通」如臺北市大眾運輸調查及規劃等；「都市行政」如各級都市計畫組織權責研究報告等；「都市環境」如垃圾收集與處理之研究等；「工業和經濟」如臺灣區域人口成長



圖 3 嚴家淦院長接見都市計畫小組首席顧問孟松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檔案（1967）。嚴家淦院長活動照片。檔案局藏，檔號：0056/0404/1



圖 4 嚴家淦院長接見都市計畫小組孟松顧問伉儷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檔案（1967）。嚴家淦院長活動照片。檔案局藏，檔號：0056/0404/1

預測等。除此之外，尚有專門的講習與人才訓練活動，在 5 年大抵完成 131 項工作，加上臺灣綜合開發計畫 1 項，與相關報告或建議 248 種，以及聯合國提出備忘錄或建議共 495 種（陳湘琴，2011）。

聯合國開發計畫委派至臺灣的國際專家，對於都市計畫與區域管理制度面向的影響，散見於各類報告書、檔案文獻。經前人研究與歸納整理，有下述 9 個面向：第一、配合經濟發展趨勢研擬未來都市人口分布政策。第二、審定臺北基隆、臺南高雄、臺中三大都會區計畫及其建設方案。第三、審議現有土地制度、包括區域計畫、土地徵收、稅課、建築與土地分區、國民住宅等法規體制建立。第四、辦理有關人口、社會、經濟、環境衛生及住宅資料收集、分析。第五、研究交通及公共運輸的需求，改進交通法規，規劃大眾運輸系統。第六、審議公共設施的標準、實務與範圍，包括電力、防洪、排水、淨水、汙水設施，以及廢棄物收集處理系統。第七、都市行政及財務。第八、都市規劃立法規制、相關機構。第九、培訓住宅及實質規劃人才（林秀澧、

高名孝，2015）。

在這 5 年間，聯合國開發計畫與臺灣開啟都市計畫合作模式，各項計畫擬定、大小挑戰，及最終成果尚待研究，以評估該計畫對臺灣都市發展之影響。尚可一提的是，聯合國形塑的技術合作模式，經常由國際專家給予會員國最直接的協助，透過不同領域專家實際考察受饋的會員國，因地制宜提供建設性意見和擬定計畫方針，改善迫切性的問題。過程中，國際專家不斷分享自身經驗，透過訓練、教育會員國專門人才，待計畫結束之際，該國專門人才已可接替國際專家，繼續規劃各項政策，成為後續計畫執行的中流砥柱。1966 年，臺灣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簽定都市及住宅發展計畫，重點有：協助政府建立都市及區域發展的法制、計畫及其執行程序，以及設立長期發展公營或民營機構，執行各項計畫，並建立一套訓練計畫，教育國民住宅、都市及區域發展在職人員與大專畢業學生（註 13）。因此都市計畫小組成立後，號召在公營機構服務的技術官員與國際技術專家討論各類議題，彼此交換意見，俾利貼近實務，執行各項作業。另一方面，

都市交通、都市土地、住宅、都市行政、都市環境研究小組的召集人與委員，也網羅國內專業人員、業務主管及優秀學者專家，一同針對現實狀況展開調查、分析、整理，蒐集基本資料和數據，再透過分工合作、協調聯繫，配合研究工作的進行。各分組會議討論不僅達到集思廣益的功效，國際專家也經常參與其中，和各組在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研究議題上互相激盪，激發彌足珍貴的研究成果（註 14）。

根據王章清回憶，都市計畫小組經常維持 6 至 8 位國際專家在臺灣，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西德、以色列等不同國家，其中首席顧問孟松是都市計畫專家，孟松夫人（Astrid Monson）是頗負盛名的都市社會學家，雖然她是無給職，但仍全程參與各項討論，全心投注工作。至於其它國際專家，分別富有都市交通、國民住宅、市政資料、都市設計專業技能。公共工程局為了讓國際專家能夠儘速融入臺灣，加速技術合作事業進度，調派臺灣各部會專業人員前來協助工作。因此，每位國際專家到臺灣報到後，就有一位國內專門人員全程搭檔，一起討論問題，觀摩各項技藝；另一方面，也甄選許多受過都市計畫教育的青年，跟隨著這些國際專家組織研究團隊，讓他們從實務中獲得訓練。都市計畫小組要求每位國際專家赴臺灣報到後，在 1 至 2 個月內充分瞭解臺灣環境，必須憑恃專業發掘問題，提出工作計畫與執行時程。都市計畫小組執行秘書王章清每週親自主持會報，國際專家及其搭檔必須輪流報告前一週工作情形，以及下一週預定進行的工作事項。國際專家不辭辛勞，除了白天擔負的各項工作，還經常利用晚上時間，向小組年輕人員，或是相關單位、學術機構學生講授專業課程，分析都市計畫理論，與介紹各國嘗試的方法和成果（王華燕編，2018）。總而言之，都市計畫小組與國際專家從討論問題至汲取共識的過程中，國際專家親自教授西方都市發展概念，傳授在其他

國家的工作經驗，兼具技術交流與教育的雙重效果，也讓臺灣專門人員能夠藉此平臺瞭解其他國家都市發展情況。

都市及住宅發展計畫如同之前聯合國的經常計畫、擴大計畫，也設置獎補金制度，讓臺灣人才可獲得補助，遠赴國外考察、學習。臺灣正視與國際接軌的機會，1966 年都市及住宅發展計畫核定後，聯合國開發計畫即通知臺灣可以提名人選，爭取都市計畫類出國考察、進修，而大部分相關費用將由該組織支應。都市計畫小組重視人才培育，幾經討論後，準備推派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副局長方開啟，或臺灣省公共工程局道路工程處主任葉昌鑄 2 人參與角逐。然而，方開啟已經獲得聯合國技術協助獎補金，將在 1966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7 日參加美國匹茲堡「人口都市化有關之開發政策及計畫」研討會。方開啟在公共工程局擔負任務與都市計畫小組密切相關，計畫前往美國開會後，就近考察美國區域計畫、都市住宅發展，為期 2 個月，待返回臺灣後再配合都市計畫小組所指示各項工作，以助益政策擬定與方案的執行。另一位代表葉昌鑄是交通工程專門人員，將轉往都市計畫小組服務，可請他前往歐洲研究交通工程 3 個月，必能協助該小組擬定更完善的都市交通政策。最後，王章清將 2 位人選簡要經歷提供孟松參考，都獲得其樂於推薦的評價（註 15）。

1967 年 4 月，經合會鑒於該項獎補金僅提供 1 名員額，經整合各項條件，核定都市計畫小組葉昌鑄獲得聯合國特別基金之都市及住宅建設項目，提供交通運輸類獎補金。5 月 2 日，葉昌鑄啟程前往荷蘭、瑞典、挪威，在這些國家各考察 2 個星期，又至丹麥觀察 3 星期，再轉往其他地方繼續調查，前後總計 3 個月。待考察結束後返回臺灣，立即提交報告書，在都市計畫小組分享觀察心得。葉昌鑄返回臺灣不久，聯合國開發計畫駐華辦事處在 10 月 23 日聯繫外交部，說明

將以技術協助管理局的名義，聘請葉昌鑄擔任國際都市交通專家，前往韓國考察，再依據考察結果，提供當地專業援助，希望徵詢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同意。對於此事，外交部依照聯合國獎補金的規則，認為其核授獎補金初衷，是為了讓受領人能夠增進業務上智識與技術，有助工作實務的改進。因此，獎補金受領人應於研習結束後返回臺灣，在原工作崗位服務至少 2 年，提送研習報告。另外，外交部根據 1966 年 3 月 15 日「申請聯合國技術協助審查委員會」決議，若是受領人完成研習課程與考察後遲不返國，或返國後不在原服務機關工作至少 2 年者，原推薦機關可追索獎補金全部費用。由此觀之，葉昌鑄返回臺灣尚未超過 2 年，若申請應聘聯合國專家前往韓國服務，顯然未能符合法令規範。經合會根據外交部的說明，再與都市計畫小組溝通，認為臺灣缺乏都市交通人才，歉難同意聯合國開發計畫駐華辦事處應請葉昌鑄出國服務（註 16）。由此可知，葉昌鑄個人各項表現優異，方能獲得聯合國獎補金培育，並深得聯合國開發計畫高度賞識，雖然限於法令規章，無法前往韓國服務，但是對都市計畫小組而言，其個人必定能夠提供寶貴建言，裨益臺灣都市交通的規劃及其計畫之執行。

1967 年 1 月 10 日，經合會依據聯合國特別

基金之指示，提名該會第一處技正陳莘為聯合國都市計畫「結構工程」獎補金候選人，陸續前往日本研習房屋地震試驗、美國西岸研習防震建築，以及法國、義大利、瑞士、荷蘭研習預鑄及廠製房屋等技術，為期大約 4 個月。陳莘完成國外考察行程，返回臺灣後，先後投注都市計畫小組主持之防震建築法規的擬定，以及預鑄廠製房屋設計與推廣作業（註 17）。在此之後，中華民國留意聯合國開發計畫「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獎補金申請作業，每年都爭取機會，提名專業人員角逐，留意選才出國進修機會（曾華壁，2014）。例如 1970 年，陸續選送王雪玉、曾立成、寶克勤、黃詠涼、辛晚教（1938-2017）等人赴外考察（見表 1），透過國際進修管道，廣續培育臺灣都市計畫專業人才。後來，情勢出現變化，這些專業人員赴外進修、考察行程也有所調整（註 18）。

又都市計畫小組為擴大訓練年輕學子，籌劃開設多門專業課程，試圖與學校共同合作，以培育未來投注都市計畫事業的新血輪。因此，都市計畫小組與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商議後，將課程列入學分，由聯合國派遣至臺灣的國際專家教授都市計畫學、工程學、經濟學、政治學。除此之外，都市計畫小組為迫切訓練年輕人才，希望在

表 1 「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獎補金實施情形一覽表

訓練項目	地點	期限	人選姓名	備註
都市及區域計畫	美國	12 個月	王雪玉	已推薦並經核准
都市及區域計畫	美國	12 個月	曾立成	已推薦並經核准
都市及區域計畫	歐洲	12 個月	寶克勤	已推薦並經核准
都市發展之社經研究	美國	12 個月	黃詠涼	已推薦並經核准
都市發展之社經研究	歐洲	12 個月	林益厚	已推薦並經核准
都市土地經濟	美國	12 個月	辛晚教	已推薦並經核准

資料來源：外交部檔案（1970）。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獎補金實施情形一覽表，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一）。檔案局藏，檔號：0055/635.31/0270

臺灣大學成立都市計畫系或研究所，但後來因缺乏建築物而未能辦成。之後，中興大學周一夔院長籌劃成立都市計畫研究所，在都市計畫小組鼎力協助下，1968年成立臺灣第一個都市計畫研究所，提供都市計畫技能訓練，培育年輕學員投入都市計畫工作行列。1980年代，臺南成功大學成立都市計畫學系、研究所，肩負南臺灣都市計畫人力培育重任。爾後，臺灣大學、逢甲大學陸續設立都市計畫研究所，培養研究都市計畫與城市設計人才，不斷在都市及區域規劃拓展研究，為臺灣都市計畫研究累積豐碩的成果（賀陳旦訪問、謝采秀紀錄，2000；曾華璧，2014）。

肆、臺北市的都市發展

臺北設府始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是清日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1820-1879）奏請清廷在臺灣島北部設置官署及行政區劃。至1885年（清光緒11年），臺灣歷經清法戰爭後建省，劉銘傳（1836-1896）擔任首任巡撫，隨即在臺北廣設店鋪、規定路寬，規劃農田、水利和交通發展目標，大抵是臺北市都市計畫初始階段。1895年（清光緒21年），日本與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後接收臺灣，開始管理殖民地，後因應臺北市人口累增，推展都市計畫項下有關公共衛生與地下水道的建置。1932年，臺北市轄區向東擴展至松山地區，都市計畫也出現公園、機場等公共設施。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之際，政府劃臺北市為省轄市，行政區域未有變動。1949年12月，政府撤退臺後，政治中心大抵以臺北市為核心。1950至1960年代，臺北市商業快速發展，都市人口大增，人口密度增高，市區建築林立、交通運輸忙碌，浮現都市化的隱憂。

至1967年初，報刊媒體紛紛報導政府欲將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很多人認為改制是調整臺

北市範圍的最佳機會，也是唯一契機，必須充分把握。惟對於行政區域範圍的劃分，出現諸多不同聲音。有人認為臺北市改制後的行政區域，除了保留原先臺北市的幅員，還要將臺北縣淡水鎮、內湖鄉，以及陽明山管理局與其所轄的士林鎮、北投鎮一併劃入，俾利全盤規劃未來都市建設，尤其可藉此開闢臺北港，讓臺北市能夠如同理想中的大都市、工商興盛城市，具備一個國際貿易港口，讓進口原料與出口貨物可直接裝卸起運（張祥傳，1967）。若是如此，臺北市不但具備國際大城市發展規模，更能拓展國際商貿發展，加速臺灣產業進展。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臺北市的行政區域，在保留原本幅員基礎上，可再將陽明山管理局所屬北投、士林兩鎮，以及臺北縣淡水鎮與三芝鄉、石門鄉、金山鄉、萬里鄉、內湖鄉，以及汐止鄉北部等全部劃入，以利未來城市整體發展。總之，臺北市將改制院轄市的消息曝光後，如何擴張幅員與未來規劃，引起各界極大的關注。

都市計畫小組亦針對該案進行研究，以大臺北都會發展為導向，收集許多實質性問題的未來發展藍圖，例如道路系統、都市交通、防洪、水源、廢水系統、垃圾處理、學校、地區分布等。都市計畫小組依據這些藍圖，歸納結果為廢除臺北縣，將臺北市附近屬於臺北縣的鄉鎮都併入嶄新的臺北市，包括板橋在內，其餘的農業地區則分別劃歸桃園縣、宜蘭縣。隨著臺北市改制院轄市引起爭議，李國鼎特別邀請孟松夫婦、王章清親自至士林官邸晉見蔣中正（1887-1975）總統，對改制後臺北市可能劃定範圍提出報告，當下即建議以覆蓋實質計畫最大區域，作為改制後臺北市的管理範圍，將使大都會區達到整體性均衡發展的目標。蔣中正雖然同意該項建議，但後來臺灣省政府討論該項議案，臺北縣民意代表紛紛表示反對意見，甚至趁臺北市（省轄市）長高玉樹（1913-2005）巡視三重時，臺北縣各級民意代

表號召民眾嚴厲抗拒。臺灣省政府為平衡政治發展，決定以淡水河為界線，維持臺北縣實質存在。後來，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涵括範圍由原本 72 平方公里，納入鄰近士林、北投、內湖、南港、木柵、景美等六個鄉鎮，僅擴展至 272 平方公里（王華燕編，2018），就此侷限臺北市都市發展範疇。

臺北市從省轄市升格為直轄市，改制後行政管理面積擴展，原本隸屬臺北縣的士林、北投、內湖、南港、木柵、景美等鄉鎮劃歸臺北市，而這些鄉鎮併入臺北市之後必須重新整合，進行全盤都市計畫。為了爭取各方意見，王章清還特別借助孟松的協助，為臺北直轄市都市發展擬定綱要計畫，提供各界參考（曾華璧，2014；王華燕編，2018）。

1967 年，臺北市正式升格為直轄市，各項市政建設與都市規劃工作接踵而至。1968 年，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與交通部長孫運璿（1913-2006）籌劃如何消除臺北市華山至萬華段鐵路所形成的 18 個平交道。王章清主持研究小組，邀請都市計畫小組中外專家討論，最終歸結較簡單方式是不移動鐵路，透過搭建高架橋橫跨市區街道，或以地下穿越道的立體交叉型態呈現，但是，多數道路並沒有足夠空間，使得這些辦法難以落實。若決定將該段鐵路進行地下化，初步估算所需經費超過政府財政負擔，加上當時臺灣鐵路尚未電氣化，通風技術未臻完善，也使該案窒礙難行。因此，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將鐵路高架化，所費金額約新臺幣 10 餘億元，兩邊加設隔音牆減少噪音，再對鐵路高架強化景觀裝飾。最終，都市計畫小組決議採取鐵路高架化，但提案送至行政院會議討論時，正反意見交雜，經爭辯後才勉強通過「臺北市鐵路高架案」，由國家安全會議核准後拍板定案。由於該高架案所費不貲，臺灣緊急向聯合國所屬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申請貸款，充裕建設

資金。1969 年 9 月，亞洲開發銀行通過「臺北市鐵路高架案」貸款案，但經合會主任委員蔣經國（1910-1988）又召開會議討論，決議必須重新評估，停止臺北市區鐵路高架計畫。中華民國緊急向亞洲開發銀行撤銷貸款，「臺北鐵路高架案」成為歷史名詞（王小娥、王明蘅編，2012；王華燕編，2018）。

整體而言，這些國際專家傳授很多各國都市發展問題與國外都市計畫經驗，相關見解頗佳，有助臺北都市的發展，但是受限建設資金籌措困難，各項建設技術，能夠具體落實的方案則不多見（曾華璧，2014）。

伍、結論

1949 年，政府撤退至臺灣，臺灣建設百廢待舉。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恢復對華軍事與經濟援助。臺灣在美援環境，抗衡中共武力進犯，安定社會秩序，快速發展經濟。1960 年代初期，臺灣歷經多年發展，衍生許多社會問題，如住宅供應困難、分配不均，以及交通紊亂相繼而起。隨著環境改變，政府必須擁有明確方針，妥善規劃都市發展，方能因應叢生的都市問題。

除了臺灣，全球許多國家也紛紛浮現都市問題。聯合國注意到各國共同的難題，致力投注都市計畫作業，邀請會員國舉派人選赴國外觀摩，借鏡他國都市發展經驗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不定期召開國際都市計畫大型會議，群策群力凝聚共識，設法解決都市化的種種問題；除此之外，聯合國也提供技術援助計畫，讓會員國透過計畫的申請，由聯合國提供實質性的技術援助。中華民國為聯合國會員國，試圖瞭解各國都市計畫策略之擬定，以及都市計畫作業的策略，因而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申請援助，成功爭取國際都市計畫專家十餘人蒞臨臺灣指導。爰此，經合會依照規定成立都市計畫小組，作為國際技術交流的平

臺。爾後，聯合國特別基金、聯合國發展計畫因應都市計畫小組的成立，遠從歐美延聘來到臺灣的國際專家，為戰後臺灣都市計畫領域之技術合作打開新扉頁。這些聯合國都市計畫專家以美國籍最多，其中以孟松夫婦對臺灣的影響最深遠。進一步觀察，聯合國都市計畫專家顧問團來到臺灣前，大多曾在世界各國擔任過要職，具備都市規劃實務經驗，發表過許多專業研究著作，都是每一個領域的佼佼者。當他們抵達臺灣後，細心觀察臺灣都市問題，重視社會公義與均衡性，對1960年代臺灣都市與區域發展現況問題進行深度分析，與提出寶貴的建議，在建構都市及區域計畫體制有諸多貢獻（林秀澧、高名孝，2015）。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前，國際都市計畫專家無不致力研擬臺灣都市發展方針，也讓臺灣都市發展順利與國際接軌。

另外，聯合國都市計畫顧問團對培訓臺灣本地都市規劃專業人才，也是不遺餘力。透過都市計畫小組平臺，臺灣都市計畫技術官員、年輕學員可與國際專家共事，透過意見交流，不斷汲取新觀念、新知識，經由國際專家介紹歐美國家發展經驗，對技術官員、年輕學員在新市鎮開發、區域規劃見解必然有所啟發。可再關注的是，特別基金與擴大方案如出一轍，透過獎補金制度，選拔專業人才赴國外考察、進修。臺灣前前後後舉派多位都市計畫專員赴歐美觀摩、學習，回國後與同儕分享寶貴的經歷，甚至介紹全球新觀念。換言之，臺灣工作團隊在工作崗位服務之際，也不斷汲取新養分，充實全球都市計畫策略新知，也讓臺灣各項作業能與國際進展相契合。特別的是，在都市計畫小組指導下，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逢甲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先後設立都市計畫學系、研究所，廣續培育都市計

畫新血輪，不斷蓄積臺灣新一代都市計畫人力，積累豐碩的研究能量。

都市計畫小組工作成果，對臺灣日後區域與都市發展、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影響深遠，經過臺灣技術官員、年輕學員與國際技術專家共同努力，約莫5年時間完成131項工作，加上1項臺灣綜合開發計畫，以及248類相關報告與建議案，另外還有國際技術專家提出的重要備忘錄或建議計495種。從前文中揭示1967年臺北市升格改制、1968年臺北市鐵路高架化等案例觀察，不難掌握國際技術專家思慮縝密，見解極佳，對臺北都市發展規劃貢獻良多。惟各項工作背後亦有嚴峻挑戰，尤其龐大資金籌措困難，讓能夠具體落實方案只能屈指可數。儘管如此，吾輩未能因此漠視都市計畫小組工作成果。同樣是交通問題，臺北市自1960年開始淘汰三輪車，唯獨起初成效始終不彰。孟松調查臺北市交通運輸系統，認為臺北市街道交通過於擁擠，是各式各樣交通工具所造成，例如大卡車、小汽車、雙輪機動車、機器腳踏車、舊式三輪貨車、腳踏車、三輪車和各種手推及獸力拉行車輛四處可見，一旦交通工具龐雜，除了應避免慢速者不適在高速道路行走，必須淘汰舊式交通工具，避免交通容量擁擠。該項建議，後來成為臺北市都市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使市政府決定全面淘汰三輪車，以改善臺北市交通亂象。同屬於臺北市都市問題，國際技術專家也曾考究臺北市自來水供應，以及下水道和污水問題，指導完成各類規劃案，充作臺北市都市發展之參考。除臺北市之外，相信都市計畫小組與國際技術專家對臺灣其他都市發展與區域規劃之落實，必有值得探索的內容，值得你我投注研究，方能全面觀察聯合國與臺灣都市計畫合作全貌，凸顯國際技術合作的真諦。

參考文獻

- 王小娥、王明衡（編）（2012）。王雪玉、廖彥豪、徐燕興訪問：姜渝生早期在「經合會」交通組織回憶工作。
 吾道行：姜渝生教授言行與追思。臺南：臺南市廿一世紀都市發展協會。
- 王華燕（編）（2018）。王潔／王章清昆仲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林秀澧、高名孝（2015）。計劃城市：戰後臺北都市發展歷程。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 張祥傳（1967）。臺北院轄市建設發展計畫。臺北：市議會秘書處。
- 許家緯（1999）。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1966-1971）對臺灣都市規劃影響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未出版碩士論文，臺北。
- 許峰源（2015）。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1950-1960）。呂芳上（編），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臺北：國史館。
- 陳湘琴（2011）。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UHDC）和聯合國顧問團研議臺灣「都市計畫法」之歷史研究。環境與藝術學刊，9，47-67。
- 曾華璧（2014）。戰後臺灣都市建設與環保工作的參與：張祖璿先生口述訪談。臺灣文獻，65（1），203-243。
- 賀陳旦（訪問）、謝采秀（紀錄）（2000）。張祖璿先生訪問紀錄。呂芳上（編），都市計畫前輩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121-130。
-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譯（1964）。臺灣省都會區域與國民住宅計畫：聯合國技術協助管理局孟遜顧問研究報告。臺北：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
- The Technical Assistance Board. (1958). *The Expanded Programm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

註釋

- 註 1 可參考張有溢（1975）。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演變始末。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葉振輝（1977）。蔣廷黻與中國外交：特別注重 1947 年至 1961 年之一時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沈碧雲（1980）。外蒙古進入聯合國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劉志攻（1984）。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的參與：外交政策、國際環境及參與行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許璦馨（2007）。中華民國於聯合國代表權之變更：自緩議案更動為重大議題之決策過程。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蔡秉修（2008）。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歷程之研究（1949-1971）。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桃園。王正華（2009）。蔣介石與 1961 年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史館館刊，21，95-150。王正華（2010）。蔣介石與 1971 年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史館館刊，26，131-176。涂成吉（2008）。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最後日子——臺北接受雙重代表權之始末。臺北：秀威資訊。
- 註 2 可參見蕭道中（2006）。冷戰與中華民國外交：控蘇案研究，1946-1952。輔仁歷史學報，17，471-515。蕭道中（2008）。冷戰時期的聯合國政治——1955 年整批交易入會案研究。政大歷史學報，29，161-196。許峰源（2010）。中華民國對聯合國會費的攤付（1946-1971）。政大史粹，19，89-148。
- 註 3 中華民國與國際法院、世界衛生組織之關係，可參考許峰源（2004）。中華民國對國際法院法官之爭取。近代中國，158/159，59-78。許峰源（2015）。世界衛生組織與臺灣瘧疾的防治（1950-197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 註 4 清末民初中國與萬國郵政聯盟之互動，可參考許峰源（2005）。中國國際化的歷程：以清末民初參與萬國郵政聯盟為例。中興史學，11，1-22。中國與國際聯盟互動，可參見張力（1999）。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註 5 葉清平（1960）。聯合國技術協助概述。國際技術合作（中國聯合國技術合作協進會），創刊號，21。

- 註 6 1966 年 1 月，聯合國特別基金與擴大方案合併為「聯合國開發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繼續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的改善，適時予以援助。臺灣與聯合國特別基金的互動，可參考張力著，川島真譯（2007）。《國連特別基金と臺灣經濟建設。收入緒方貞子、半澤朝彥編，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の歴史の変容：国連と国際政治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35-252。
- 註 7 外交部檔案（1966）。方開啓：參加聯合國主辦「有關都市化的發展政策和計畫」區際討論會報告，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一）。檔案局藏，檔號：0055/635.31/0270。
- 註 8 外交部檔案（1962）。外交部收臺灣省政府函：為請聯合國申請特別基金資助都會區域計畫（1962 年 3 月 10 日）、外交部收內政部函：關於聯合國特別基金申請協助實施「都會區域設計計畫」事（1962 年 6 月 15 日），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
- 註 9 外交部檔案（1962）。Application for 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 Regional Planning Project Taiwan, China（1962 年 8 月），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外交部檔案（1963）。外交部收臺灣省政府函（1963 年 6 月 10 日），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
- 註 10 外交部檔案（1961）。聯合國協助我都市發展與國民住宅計畫洽辦經過籌設小組情形報請公鑒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o ROC：DP/SF/R.1/Add.15，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有關中華民國向聯合國特別基金爭取都市計畫合作過程，亦可參考王章清回憶孟松前往臺灣調查後提出報告，認為中華民國需要一個顧問團前來協助。恰逢王氏甫獲世界衛生組織獎補助金，至美國馬里蘭州巴爾迪摩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從事一年研究工作，常在週日前往紐約，並於週一偕同孟松到聯合國，與主管亞洲事務的瓦茲先生（Kenneth Watts）協商，最後獲得成功。王華燕編（2018）。《王潔/王章清昆仲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註 11 陳湘琴（2011）。都市建設與住宅計畫小組（UHDC）和聯合國顧問團研議臺灣「都市計畫法」之歷史研究。《環境與藝術學刊》，9，50。都市計畫小組成立之際，小組職員 43 人，向內政部、臺灣省財政廳、社會處、公路局以及公共工程局借調 11 人協助。外籍顧問最初 7 人，其中 5 人為聯合國特別基金顧問：首席顧問孟松、副首席顧問（都市計畫專家）貝爾賽（Mr. K. J. Belser）、交通運輸顧問柯義爾（Mr. L. R. Coyle）、社會研究顧問柯逸山（Mr. P. E. Kovenock）、經濟研究顧問辛慈（Mr. Alfred Schinz）。另 2 人為經合會聘派都市計畫小組顧問：土地及住宅顧問孟松愛絲夫人（Mrs. A. Monson），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兼辦都市計畫小組工作顧問：衛生工程顧問湯瑪斯（Mr. R. H. Thomas）。詳見外交部檔案（1967）。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
- 註 12 外交部檔案（1967）。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
- 註 13 外交部檔案（1966）。聯合國開發計畫（特別基金）實施方案中華民國都市及住宅發展計畫，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三）。檔案局藏，檔號：0055/635.31/0272。
- 註 14 外交部檔案（1967）。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五）。檔案局藏，檔號：0050/635.31/0274。
- 註 15 外交部檔案（1966）。外交部收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電（1966 年 9 月 13 日），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一）。檔案局藏，檔號：0055/635.31/0270。
- 註 16 外交部檔案（1967）。外交部收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函：本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葉昌鑄君前往荷蘭等國考察事（1967 年 4 月 14 日）、外交部致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函：關於聯合國技協局擬聘請葉昌鑄為聯合國都市交通專家赴韓服務徵我同意事（1967 年 10 月 31 日）、外交部收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函：關於聯合國技協局擬聘請葉昌鑄君赴韓服務事，覆請查照（1967 年 11 月 15 日），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一）。檔案局藏，檔號：0055/635.31/0270。

- 註 17 外交部檔案（1967）。外交部收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函：為提名本會第一處技正陳莘為聯合國都市計畫結構工程獎補金候選人由（1967 年 1 月 10 日），技協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案（一）。檔案局藏，檔號：0055/635.31/0270。
- 註 18 1967 年，寶克勤畢業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旋即進入都市計畫小組工作，至 1973 年離開。後來，從事房地產工作及任職太平洋建設公司，擔任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長，同時也在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開授課程。根據寶氏提供的資訊，當年接受獎補金至國外進修人員，其赴英國愛丁堡大學、黃詠涼至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林益厚與辛晚教到倫敦政經學院。又，林益厚是臺灣參與都市計畫早期工作者，著重人口與都市化、都市發展、住宅政策與計畫、國土與營建行政問題，曾出任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署長等重要職務。除此之外，1966 年當時執教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辛晚教亦兼任都市計畫小組研究員，日後長期致力研擬臺灣都市計畫制度、設計國土規劃制度、政策建言改善土地問題，與實踐文化生活圈與文化環境規劃。辛晚教是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創辦人之一，其「都市與區域計畫」充作都市計畫學界參考典籍，助益臺灣都市計畫人才的培育。